

淚水、黃河與河工：

《老殘遊記》中的洪災創傷書寫*

許暉林**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摘 要

十九世紀後期是中國現代化的關鍵時期，同時也是黃河史上決口與氾濫最為嚴重的時期。黃河治理自古是帝國內政最重要的工作，到了這個時期更成了最具急迫性的現代化工程的一部分。晚清小說家劉鶚 (1857-1909) 在 1890 年代深入參與黃河整治，並且以此作為《老殘遊記》的主題。黃河洪災所帶來的巨大災難，成為身為治河工程師的劉鶚的創傷經驗。

《老殘遊記》是第一部直接處理因大量死亡所帶來的創傷經驗的小說。在小說中，創傷是如何被描述與處理的？對劉鶚而言，洪災是否具有比單純災難經驗更複雜的技術性層面的意義？創傷療癒與河工之間的關係在小說中是否，以及如何在小說中被理解？本文試圖藉由探討《老殘遊記》如何被洪災創傷所形塑，進一步理解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環境危機與現代中國國族認同之間的關係。

關鍵詞：劉鶚，《老殘遊記》，黃河洪災，創傷，河工

* 本文為 2017/18 年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計畫，以及傅爾布萊特訪問學者計畫成果之一。又本文提交學報後，蒙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筆者獲益匪淺，一併致謝。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hlhsu@cuhk.edu.hk

一、前言

光緒三十一年（1905）秋天，四十九歲的劉鶚（1857-1909）為他即將在天津《日日新聞》上連載的《老殘遊記》初編寫了一篇自敘。這篇情感豐沛的小說自敘吸引了自 1960 年代以降研究晚清文學與歷史的學者的注意。自敘中的「哭泣說」使「抒情」一詞成為上個世紀後半以來《老殘遊記》研究的關鍵詞。¹ 同時，劉鶚於此篇自敘中對國家、社會以及種教等涉及公眾與群體的情感面向的強調，也使得這部小說成為學者探討情感現代性時無法繞過的文本。

李海燕具有開拓性意義的情感現代性研究，即是以《老殘遊記》自敘的討論作為開頭。李海燕探討情感在中國現代性轉型中的重要性，指出現代主體是一種情感性的主體，而現代民族則是一種同情式的社群。李海燕分析晚清到民國時期的浪漫小說，指出小說中出身不同門第與社會地位的男女婚戀浪漫母題，其實是以下概念的再現：每個個體都可憑藉其公民的身分達到與其他個體之間同等與公平的關係。李海燕認為這一現代情感主體的形成有其階段性，其初始階段的情感形構被稱為「儒家感覺結構」，這一感覺結構強調透過人倫情感連結自我與世界，並且超越其間藩籬。李海燕相信《老殘遊記》的自敘屬於此一「儒家感覺結構」的一環，因為劉鶚在自敘中將情感視為一種得以超越、弭平社會階級與身分差異，組織新的人類社會秩序，並且強調個體到宇宙間連續而貫通的親密關係原則。² 然而，將《老殘

¹ 普實克 (Jaroslav Průšek, 1906-1980) 在上個世紀中葉就提出以「抒情性」來理解清代之後以社會寫實為主要性格小說——如《老殘遊記》——的必要。夏志清也大約同時提出《老殘遊記》具有「抒情小說」特質的說法。李瑞騰從意象體系的角度探討《老殘遊記》中人物的山、水與哭泣，是首次從情景交融的詩學架構對於《老殘遊記》進行解釋的研究。陳俊啟則受到普實克的抒情性論述啟發，認為《老殘遊記》其實是承繼從明代以降在文人小說中日漸明顯的走向作者內在思想情感自我表述的「個人／主觀」主義，並將此一「內轉向」與五四時期浪漫派小說聯繫。近年李歐梵重新解讀《老殘遊記》中的抒情性則可以說是回應、深化了夏志清的提法。Jaroslav Průšek, *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Hsia C. T., "The Travels of Lao Ts'an: An Exploration of Its Art and Meaning,"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7.2 (1969), pp. 40-68; 李瑞騰, 《老殘夢與愛：《老殘遊記》的意象研究》（臺北：九歌出版社，2001）；陳俊啟, 〈《老殘遊記》中的「個人主觀主義」及其在小說史上的意涵〉, 《文與哲》, 12（高雄：2008），頁 579-630；劉鶚著，李歐梵導讀, 《帝國末日的山水畫：老殘遊記》（臺北：大塊文化，2010），頁 17-25。

² 李海燕著，修佳明譯, 《心靈革命：現代中國愛情的譜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頁 1-16。

遊記》自敘中的情感論述歸入「儒家感覺結構」有待商榷。《老殘遊記》自敘並非如李海燕所說的，強調「從個體的人到宇宙之間」情教式的無障礙的超越與連結。在自敘當中，由個體依序向外擴張有著清楚的界線：從個人、社會、國家，一直到種教為止。在這個意義上，《老殘遊記》自敘與其說是「儒家感覺結構」的標誌，不如說是其反證。以上提問並不是要否定李海燕所提出的架構的有效性，而是要說明從晚明以降的情教傳統理解《老殘遊記》自敘中的情感性質是有其侷限的，遑論以這一角度來理解較自敘遠為豐富與複雜的《老殘遊記》小說本身的情感話語。

《老殘遊記》當中的情感如果無法被現有的情感現代性研究框架成功納入，那麼我們可以從什麼角度談論《老殘遊記》情感書寫？本文認為環境批評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提供一個新的視角來切入《老殘遊記》的情感書寫。環境批評是從環境史研究衍生而來。自然環境作為影響人類生存條件、經驗以及人文景觀的關鍵性力量，在過往社會史、政治史與文化史研究中常常被忽略。在環境保護的思潮影響下，1970 年代後期開始，環境史學者從生態學的角度出發，試圖藉由史料重建並描述人類行為與自然環境互動的關係。環境史提出的基本問題包括：人類如何理解環境？環境變遷如何塑造人類經驗？人類如何改造環境？受到人類行動形塑之後的環境又是如何反過頭來影響人類？而作為文學研究方法的環境批評，則是試圖說明文學是如何參與、探索、思考上述人類與環境之間的關係。³

《老殘遊記》的情感書寫之所以適合從環境批評的視角來分析，首先可以從《老殘遊記》所處理的核心情感的性質來說明。《老殘遊記》的情感書寫是由黃河氾濫所引起的。1887 年 7 月黃河在河南鄭州決口，造成至少九十萬人死亡，為人類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災難之一。⁴ 劉鶚在 1880 年代後期到 1890 年代初期親身參與黃河治理的工作。1888 年 9 月劉鶚赴鄭州協助堵口工程，出謀策劃之餘亦實際操作。而 1889 年劉鶚在參與黃河測繪過程中親歷親睹山東洪災致使成千上萬無家可歸、生離死別的慘事，則成為《老殘遊記》的情感書寫的焦點。在《老殘遊記》之前雖然已有多部小說描寫洪災，但主要是作為推進情節的背景設定，從來沒有一部小說如《老殘遊記》，將洪災的創傷情感作為小說重要的主題之一。⁵ 也因此，

³ 近年關於生態批評涵蓋的議題與方法的討論，見 Greg Garrard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cocritic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⁴ 關於中華帝國晚期生態崩潰與黃河治理的問題的討論，見 David A. Pietz, *The Yellow River: The Problem of Water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43-69.

⁵ 明清小說中對於河川決口氾濫的描寫並非少見。例如明末陸人龍《型世言》、李清《櫓杙閒評》、清初西周生《醒世姻緣傳》、乾嘉時期夏敬渠《野叟曝言》、汪寄《海國春秋》、李汝珍《鏡花緣》、咸同年間石玉崑《三俠五義》、文康《兒女英雄傳》、清末佚名《林公案》、吳趼

在這個意義上探討環境、人類經驗與文學之間關係的環境批評，成為我們理解《老殘遊記》情感書寫時值得參照的理論架構。

其次，《老殘遊記》關注十九世紀末期中國的環境與政治危機之間的關係，也是本文選擇由環境批評視角切入的重要理由。十九世紀後期一向被認為是清帝國經歷最為嚴峻的政治危機時期，亦是洋務運動如火如荼地推行的時期，但同時也是黃河史上決口與氾濫頻率最高、災情最為嚴重的時期。1855 年黃河於河南銅瓦廂決口，黃河從原本向南由江蘇北部入海，改道為向東北由山東渤海入海。此後近四十年的時間，新的黃河河道極度不穩定，幾乎年年決口氾濫。作為《老殘遊記》寫作背景的太平天國、捻亂、清法戰爭、清日戰爭、庚子拳亂、日俄戰爭等內外政治危機，⁶ 從 1850 年起一直到 1905 年，橫跨了整整半個世紀。這一連串的內亂與外患剛好與黃河改道氾濫的時間重疊，其直接結果就是帝國的財政快速惡化。1855 年黃河決口與改道造成黃河河工與災民賑濟無止盡的花費，成為了國家財政的巨大破口。清政府所面對的最大問題之一，就是如何在頻繁的洪災搶險以及後續的賑濟支出與免除稅收所造成的國家財政狀況急遽下降的惡劣狀況下，在內亂、外患以及河工問題的處理上做出財政資源調動的艱難選擇。黃河決口氾濫本身既是生態與社會危機，其所導致的財政空虛又極大幅度地削弱了清政府應對整體政治危機的資源與能力。在這樣的情況下，劉鶚將黃河氾濫視為中國一切危機的根源。這也就是為什麼《老殘遊記》第一回是由黃瑞和（黃河）生病以及海上危船這兩則講述中國內外困境的寓言組成。在這個意義上，黃河決口與氾濫成了整體中國政治危機的借喻，黃河洪災災民的創傷也就成了自太平天國以來遭受內憂外患的中國集體創傷的借喻。

過去學者對於《老殘遊記》與黃河治理之間關係的分析，主要是從小說一開頭主角老殘醫治山東大戶黃瑞和（黃河）的寓言切入，探討晚清病體與國體之間類比關係的建立。⁷ 環境批評的視角則讓我們得以從一個更為具體且物質性的層面探討小說與黃河治理之間的關係。環境批評學者 Anne Raine 指出，西方文學現代性與環境科學是在二十世紀初同時產生，而環境批評的一個重要任務即是理解現代作家

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李寶嘉《官場現形記》等皆有相關描述。

⁶ 小說中直接提及的包括了太平天國（第七回）、甲申法蘭西福建、安南之役、清日甲午戰爭、庚子拳亂（第十一回）。

⁷ 顏健富對於晚清「身體」與「國體」的類比架構的形成與發展有詳細的分析。顏健富，〈「病體中國」的時局隱喻與治療淬鍊——論晚清小說的身體／國體想像〉，《臺大文史哲學報》，79（臺北：2013），頁 83-118。當中關於《老殘遊記》的討論見頁 88-89。

對於環境的探索與科學史之間的關係。⁸ 事實上，二十世紀初現代作家表現出對於環境科學以及其他科學濃厚興趣的現象，並不只限於西方。雖然劉鶚通常沒有被學者歸類為嚴格意義上的現代作家，但是學者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的討論卻始終難以繞過《老殘遊記》。這也正說明了劉鶚對於形塑中國現代小說的重要性。而如同與他同時的西方現代作家，劉鶚對於新的科學觀念以及技術——特別是他所擅長的水利技術——具有強烈的興趣。基於上述的認識，本文試圖借鑑環境批評研究對於現代文學與科學史之間關係的分析角度重新探討《老殘遊記》中的情感書寫。

本文選擇從環境批評的角度出發，提出關於小說所描述的黃河災難創傷的兩個重要問題。劉鶚的創傷來自其目睹黃河洪災的經驗，而劉鶚本身又具有深厚的河工知識背景與經驗。那麼，我們探討小說的創傷療癒書寫時，就不可能忽略劉鶚的河工觀點與技術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本文首先試圖理解小說中黃河洪災創傷及其療癒的書寫，以及此一書寫與劉鶚的河工技術之間的關係。其次，十九世紀中期以後清帝國的政治危機與生態危機的交互影響，以及劉鶚在《老殘遊記》自敘中對於國家、社會以及種教等情感的強調，都在提醒了我們必須將小說所處理的災難創傷放在晚清情感認同的語境下理解。因此，本文要回答的另一個問題即是，小說的洪災創傷書寫與晚清個人與社會及國家認同形塑之間的關係。

本文將以三節分別處理上述兩個問題。第二節將解釋劉鶚的河工技術觀點，並且說明劉鶚是如何以這些觀點為中心發展小說的洪災敘事；第三節則將藉由分析主人公老殘救助遭遇洪災的妓女的情節，探討劉鶚的河工技術觀點如何形塑小說的創傷療癒書寫；第四節則是嘗試從災後賑濟行動切入，探討《老殘遊記》的黃河洪災創傷書寫在什麼意義上參與了個人與國家之間關係的重塑。藉由將十九世紀晚期的生態災難創傷引入中國情感現代性研究的視野，本文期待能夠說明晚清文學召喚中國國族認同所需的情感力量的過程中，生態環境以及工程技術所扮演的角色。

⁸ Anne Raine, "Ecocriticism and Modernism," in Greg Garrard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cocriticism*, p. 108. 其中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學者對於美國現代詩人 Marianne Moore 的詩與達爾文式的演化生物學之間關係的探討。Robin G. Schulze, "Textual Darwinism: Marianne Moore, the Text of Evolution, and the Evolving Text," *TEXT: An Interdisciplinary Annual of Textual Studies*, 11 (1998), pp. 287-288; Robin G. Schulze, "Marianne Moore's 'Imperious Ox, Imperial Dish' and the Poetry of the Natural World,"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44.1 (1998), p. 5.

二、斜堤：一個新的河工技術觀點

咸豐五年（1855）黃河改道向北由山東入海，但是三十二年後的光緒十三年（1887）八月中黃河鄭州段南岸決口，黃河又從原本往北流向山東改道往南，匯賈魯河入淮河及運河，直奔洪澤湖，北向山東的河道因此斷流。劉鶚從淮安前往投效時任河南山東河道總督的吳大澂（1835-1902），建言河工事，隨即入吳大澂幕府。吳大澂採納劉鶚的建議，在關鍵填塞地段採用西人廣用的塞門汀（水泥），成功將鄭州決口堵合。光緒十四年十二月鄭州決口合龍之後，黃河復向北流，重新回到由山東出海的河道。隔年（光緒十五年）夏天山東境內黃河南岸嚴重氾濫，歷城以下四十六州縣夾河內村莊都受到波及。⁹ 在此同時，劉鶚奉吳大澂的命令前往山東黃河下游測繪河道，作為訂定河工策略的依據。小說對於齊東縣洪災的描寫即是以他在測量途中的親身經歷為本。

小說關於黃河洪災的描寫集中在第十三、十四兩回。第十三回中，老殘行至山東齊河縣縣城巧遇友人黃人瑞，兩人因黃河結凍必須暫住旅店等候渡河，故招翠環、翠花二妓聊以排遣寂寞。在言談間，翠花回憶光緒十五年山東齊東縣的水災。據翠花的說法，這場黃河洪災發生在光緒十五年六月，也就是劉鶚奉命到山東測繪黃河期間。第十三、十四兩回的回末評當中，同時作為評點者的劉鶚表達了他自己對此次洪災的感受：

莊勤果慈祥愷悌，齊人至今思之。惟治河一端，不免乖謬，而廢濟陽以下民埝，退守大堤之舉，尤屬荒謬之至。慘不忍聞，況目見乎，此作者所以寄淚也。¹⁰

廢濟陽以下民埝，是光緒己丑〔十五〕年事。其時作者正奉檄測量東省黃河，目睹尸骸逐流而下，自朝至暮，不知凡幾。山東村居屋皆平頂，水來民皆升屋而處。一日，作者船泊小街子，見屋頂上人約八九十口，購饅頭五十斤散之。值夜大風雨，耳中時聞坍屋聲，天微明，風息雨未

⁹ 黃璣，《山東黃河南岸十三州縣遷民總圖》（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年（1894）石印本），頁32b。

¹⁰ 劉鶚原著，徐少知新注，《老殘遊記新注》（臺北：里仁書局，2013），頁246-247。本文所引《老殘遊記》內文皆出自此版本，頁碼標註於引文後。

止，急開船窗視之，僅十餘人矣！不禁痛哭。作者告予云：生平有三大傷心事，山東廢民埝，是其傷心之一也。（頁 262）

上引評語描述的是 1889 年夏天劉鶚在山東歷城縣小街子村（今小街莊）測繪黃河時，親眼目睹的黃河南岸氾濫的慘況。小說描寫黃河大汛漫溢齊東縣城，極有可能就是取材自他在小街子村的經歷。然而，劉鶚對洪災慘況感到傷心悲痛而「不禁痛哭」，不只是因為黃河漫溢造成的大量死亡。劉鶚在評語當中清楚指出，他的「寄淚」與「痛哭」是因為對劉鶚這位河工專家而言，這完全是一場原本可以避免，但卻因山東巡撫「廢民埝」的技術判斷錯誤所導致的人為災難。莊勤果即是影射時任山東巡撫的張曜（1832-1891，諡勤果）。整部小說中老殘的「不禁痛哭」就這麼一處，卻也足以讓我們了解，小說中最為強烈的情感其實來自作者對於「廢民埝」所引發的災難的悲痛與不甘。

「廢民埝」是指廢棄近岸堤防以加寬河面，藉以降低漲水幅度的策略。對劉鶚來說，「廢民埝」究竟為什麼是個錯誤？又為何「民埝」是治河的關鍵？這就必須從黃河洪災的原因以及治水學派的爭議談起。黃河氾濫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泥沙淤積。黃河挾帶泥沙量大，淤積墊高河床造成汛期河槽容水量不足，河水漫溢過河岸堤防，甚至因水壓過大沖毀堤防形成決口。隨著河床不斷淤墊，堤防的修築也愈來愈高，導致河床與堤頂都遠遠高出地面，形成了「懸河」。一旦懸河漫溢或決口，其後果輕則造成嚴重氾濫，重則造成黃河改道。歷代黃河的整治對於去除泥沙淤積主要有兩種取徑：不與河爭地與束水攻沙。不與河爭地由漢代賈讓（生卒年不詳）提出，其作法是藉由擴大兩岸堤防的距離，放寬河面讓河槽得以容納更多水量，減低水力對堤防的衝擊，避免水位上升為堤防帶來壓力。束水攻沙則是由明代治水名臣潘季馴（1521-1595）提出，其作法是於緊臨河岸處構築相對於官方所修建的大堤的「民埝」，用以縮減河道、增加河水流速以及挾帶泥沙的能力，並進一步刷去原本沉積在河床底部的淤積，避免河床淤高。¹¹ 換句話說，民埝的存廢標誌著「不與河爭地」與「束水攻沙」兩種治水策略的差異。

¹¹ 水利史學者通常將「束水攻沙」歸功於潘季馴的獨創，但此一理論很可能在漢代已經出現，而潘季馴是第一個清楚提出並加以廣泛運用的治水專家。林天人，〈清初河防政策與河工研究：以靳輔的治河為考察重心〉，《地理研究》，45（臺北：2006），頁 95，註 10。關於當代學者對兩種黃河治理策略的評價與運用，見李文學、李勇，〈論「寬河固堤」與「束水攻沙」治黃方略的有機統一〉，《水利學報》，10（北京：2002），頁 96-102。

山東巡撫「廢民埝」的作法即是採取賈讓主張的原則，試圖以廢棄近河的民埝，退守離岸較遠的大堤的方式來放寬河面，降低河水水位。¹² 劉鶚在小說第三回中說明了這一策略所具有的潛在問題：「河面窄，容不下，只是伏汛幾十天，其餘的時候，水力甚軟，沙所以易淤。」（頁 53）老殘批評山東巡撫莊宮保忽略淤沙的問題，是基於「束水攻沙」的治水立場。¹³ 然而，在劉鶚看來，張曜放寬河身還不只是治河觀點上的錯誤，並且還牽涉到配套作法不當的問題。民埝的存廢之所以是一個棘手的問題，主要是因為民埝與大堤之間的「夾河」是具有高經濟價值的地帶。黃河沿岸居民長期以來在黃河岸邊建築民埝，以利用民埝與大堤之間廣大灘地（又稱夾河、夾堤）生產糧食或經濟作物（特別是高價值經濟作物棉花）。如果黃河沖決或漫溢過民埝，夾河內眾多人口、作物與財產將頃刻遭遇洪水淹沒。「廢民埝」不僅是河防防線後退的問題。民埝一旦被廢，居民必須放棄他們的居所、土地、財產以及長久以來賴以維生的生產方式。因此廢民埝之前應有相應的配套措施。

劉鶚在小說第十三、十四回藉由翠花和黃人瑞的轉述，毫不客氣地批評了張曜在執行「廢民埝」策略時的配套措施。根據翠花的說法，巡撫原本有意籌款給居住在夾河內的民眾作為遷村之費，但後來卻聽信幕僚的建議，沒有讓民眾知道廢民埝的決定，以免幾十萬人死守民埝，導致廢埝之計難以進行。這樣的說法暗示了巡撫在執行放寬河身的策略之前，並沒有籌錢將夾河中的居民遷往別處的準備，如此一來，巡撫形同是一次謀殺幾十萬人的兇手了。但是，黃人瑞則另有一套說法。依照

¹² 小說提到宮保主賈讓「不與河爭地」之說放寬河面並非毫無根據。1889 年 3 月中張曜友人康際清在給張曜的信函當中讚美張曜整治黃河的成績，並提到他聽聞張曜因師法賈讓三策，被人以為可與賈讓媲美。然而，張曜其實對於河工非常嫺熟，並非像小說所描述的對於河工那般無知。張曜一到任就花了相當大的心力與經費在修築民埝，而不是只採取寬河的策略。事實上，張曜自己對於放寬河面一事也是有所反省的。就在接到康際清來信的幾天前，張曜上奏給光緒皇帝說明山東現況時承認了自己放寬河面策略的錯誤：「究河身狹窄之長清、平陰、東阿等縣，南岸一帶向無民埝，齊東以至利津，南岸民埝殘缺，向未估修。在原以為展寬河身之計，河淤愈高，地轉低窪，村莊田廬皆浸於洪流之中。」張懷恭、張銘，《清勤果公張曜年譜》（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頁 73、108、110。就如同歷來負責黃河整治的官員一樣，究竟該採取束水攻沙還是放寬河身，對張曜來說一直是個兩難。

¹³ 這一段對話的內容與光緒十五年劉鶚上呈給張曜的治河說帖內容相一致。光緒十五年九月，距劉鶚投身河圖測繪已經五個月。劉鶚將他觀察測繪所得寫成〈治河五說〉寄給張曜以及河圖局總辦易順鼎（1858-1920）。〈治河五說〉的第一說「河患說」首段就開宗明義批評漢代賈讓「治河三策」當中「不與河爭地」的看法，而其第二說「河性說」首段論王景從《尚書·禹貢》悟「播」與「同」二法，則是小說中老殘與宮保的對話的另一重點。劉鶚著，劉德隆整理，《劉鶚集》上冊（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頁 39、46。

黃人瑞所言，宮保在聽從幕僚建議決定廢民埝的同時，也考慮要先將夾河內的居民遷往別處，「後來聽說籌了三十萬銀子，預備遷民。至於為甚麼不遷，我卻知道了。」（頁 257）人脈良好、消息靈通的黃人瑞，連對宮保與幕僚之間的對話細節都一清二楚，對於籌了錢卻不遷民一事竟然只用一句「至於為甚麼不遷，我卻知道了」輕輕帶過。在河工向來為清朝官員最大油水來源的情況下，¹⁴ 黃人瑞這句話的確殊堪玩味。我們該怎麼理解小說裡同時呈現兩種關於張曜治水決策形成過程的不完全可靠而且相互矛盾的說法呢？官方對於水災當時負責採取因應措施的地方官員的評價，或許可以作為我們回答這個問題的線索。

張曜光緒十三年（1887）五月出任山東巡撫。隔年秋天河南鄭州決口，黃河往山東的河道斷流，時間長達一年多。在這一年多當中山東並無嚴重水患。光緒十五年水災發生之前，山東巡撫張曜也尚未有遷民的計畫。張曜真正認真考慮遷民是在光緒十五年的水災之後。據時任山東司振局總辦的候補道黃璣（生卒年不詳）的說法，他於光緒十五年向張曜提出將夾河中的居民遷出的建議，並「請守隄棄埝，讓地於河，一則保全民命，悉出災區，一則展拓河身，藉除水患。」¹⁵ 這樣的建議被張曜所採納，十六年春天張曜批准選擇受洪水災害最重的齊東、青城、濱州等縣試辦遷民。為了籌措遷民的巨大費用，張曜上奏開辦賑捐，經議准於十七年二月在十二省設局勸辦，由黃璣擔任總辦。張曜於十七年八月在任上過世，由福潤（生卒年不詳）接替山東巡撫，任命黃璣為遷民總辦。自光緒十七年到十九年間，「歷年所遷共舊莊五百零二處，共成新莊五百零一處。」¹⁶ 這次的籌款遷民的作業看似順利。然而，正如學者所指出的，在黃河治理工作中，工作重擔以及對專業技術的需求使得擴張非正式官僚機構成為必須，從而削弱巡撫、總督對整個過程的控制力，也增加了貪汙收賄的機會。¹⁷ 黃璣在光緒二十年被接任福潤為山東巡撫的李秉衡（1830-1900）參了一本，稱他「庸劣不職」、「攬權納賄」。¹⁸ 二十四年開復原官原銜後旋因「奔走關說……賑務放少報多……從中分肥，民怨沸騰」，¹⁹

¹⁴ 清代河工貪汙情況普遍而且嚴重，成為清政府最為重大的經濟問題來源之一。關於清代河工貪汙問題的討論，見周魁一，《中國科學技術史·水利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頁 449-462。

¹⁵ 黃璣，《山東黃河南岸十三州縣遷民總圖》，頁 33a。

¹⁶ 同前引，頁 34a。

¹⁷ Randall A. Dodgen, *Controlling the Dragon: Confucian Engineers and the Yellow Riv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pp. 46-51.

¹⁸ 鄂爾泰等奉敕修，《德宗景皇帝實錄》，《清實錄》第 56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353，頁 586b。

¹⁹ 鄂爾泰等奉敕修，《德宗景皇帝實錄》，《清實錄》第 57 冊，卷 435，頁 716a。

「前在山東聲名本屬平常，辦理賑款銷冊又不據實開報」而被革職。²⁰ 當我們從這樣的脈絡去理解，就會發現張曜對於治水策略的選擇，與在張曜底下總辦勸賑與遷民，卻趁機大撈油水的候補道黃璣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小說中翠花稱那些主張廢民塹的幕僚們為「總辦候補道王八旦大人」（頁 245），恐怕不是劉鶚隨意的安排。

黃人瑞與翠花說法的出入，恰恰好提醒了讀者進入張曜治河策略的問題關鍵處。雖然兩人的版本彼此矛盾，但卻分別指向張曜「不與河爭地」策略的實際執行層面的問題。黃人瑞的說法凸顯了遷民花費甚鉅，徒給辦理勸賑與遷民作業的官員從中分肥的機會。翠花誇張的說法則是指向更為根本的問題：張曜忽視遷村過程中遭遇到的來自民眾的反彈。小說批評的力道並不止於張曜所主張的「不與河爭地」的治河策略，同時也延伸到與此一策略連動的辦賑與遷民措施的不當。

事實上，劉鶚也並非不明白遷民並非容易做的事。劉鶚在上呈給張曜的〈治河五說〉當中說：「嘗見遙堤以內，夾河之間，萬民淪沒，慘不可言。在上曾設法以遷民，在下則至死而不去。」²¹ 然而，從劉鶚的角度來說，遷民是為了廢民塹，廢民塹則是為了「不與河爭地」，因此遷民之舉本身就是一個錯誤治水方法所產生出來的錯誤措施。在他看來「不與河爭地」與「束水攻沙」兩者的優劣顯而易見：

竊考古今言治河者約分兩派：一主賈讓不與河爭地之說，其蔽也易淤；
一主潘季馴束水功〔攻〕沙之說，其蔽也易溢。然淤之患遠，禍在後人；
溢之患近，害則切己。……不知主潘之說，有善用者，即可不溢；
主賈之說，雖神禹復生，不能不淤。²²

劉鶚認為兩者皆有利弊。「不與河爭地」因為河寬水緩導致淤積，「束水攻沙」則因為河道狹窄導致漲溢。但是如果能夠善用「束水攻沙」的方法，是可以避免其易淤的問題。那麼，怎麼樣算是「善用」呢？他反覆籌劃之後，認為「只有師禹播九河、王景八河之意」才是一勞永逸的方法。²³ 小說第三回老殘對宮保提出了治河的建議，講的就是這一套方法。老殘告訴宮保治水的重點在於「播」與「同」兩

²⁰ 同前引，卷 441，頁 807a。

²¹ 劉鶚，《劉鶚集》上冊，頁 40。

²² 同前引，頁 43。

²³ 同前引，頁 40。

字，這二字心法是他從漢朝王景 (30-85) 處承襲而來。老殘接著解釋，王景的方法是從《尚書·禹貢》的「播為九河，同為逆河」上悟出來的。明代的潘季馴與清代的靳輔 (1633-1692) 則是「皆略仿其意，遂享盛名」(頁 53)。劉鶚在他的〈治河五說〉當中說明了這一條譜系：大禹為了解決因黃河中游水力強勁易氾濫的問題，將黃河中游的河水分流(播)為九股支流；同時為了解決因黃河下游尾端處水力減弱而容易淤積的問題，大禹又將原本分流出去的九股支流匯合(同)加強其挾帶、沖刷泥沙的能力。到了漢代，王景將黃河分流為八河，再合之使由山東千乘入海，是完美地師法了大禹「播」與「同」的治河策略。至於明代潘季馴、清代靳輔、黎世序 (1772-1824) 等人設閘壩以宣洩河水即是「播」的應用；束水攻沙、築壩蓄清水沖刷淤泥(引清逐淤)之法則是「同」的應用。²⁴ 小說中老殘建立起了一條從大禹、王景、潘季馴、靳輔，最後一直到老殘的治水方法傳承譜系。

然而，王景治河是從「播」與「同」這兩字上悟出來的說法並不見於文獻，而是老殘自己的說法。那麼，真正從《尚書·禹貢》中「播」與「同」二字上悟出治河方法的是誰呢？在〈治河五說·河性說〉當中，劉鶚自云：「伏讀《禹貢》導漾、導江、導沅、導淮、導渭、導洛皆以一『導』字貫之。惟河，則於導河、積石而後又復曰播、曰同。」²⁵ 原來從頭到尾，由「播」、「同」二字上悟出治河方法的不是別人，就是劉鶚自己。如此一來，老殘(或劉鶚)不只是越過潘季馴與靳輔上接王景，而根本就是將他自己比作大禹唯一傳人，古今天下第一治水專家王景。

那麼劉鶚從《尚書·禹貢》悟出的「播」與「同」原則是如何具體實踐於其治河工程上？這就必須從劉鶚的設計與傳統堤防系統的差異談起。雖然老殘與宮保的對話呈現出「不與河爭地」與「束水攻沙」兩派之間的爭論，但其實從明代後期到晚清，「束水攻沙」一直都是治水策略的主流。晚清的黃河堤防系統基本上是沿襲自明代潘季馴「束水攻沙」理念的設計，也就是主要以民埝、大堤與格(隔)堤組成。近河的民埝與距離河岸較遠的大堤基本上是平行的，而格堤則是與水流方向呈九十度直角，連接民埝與大堤，使兩堤間的灘地分隔成塊。當洪水沖決民埝時，格堤可以將淹水限制在一定範圍之內。²⁶

²⁴ 同前引，頁 39。

²⁵ 同前引。

²⁶ 潘家錚，《千秋功罪話水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0)，頁 28。

劉鶚在其〈治河五說〉中提出了兩個與過去河防系統不同的設計：「築斜堤以澄淤填堤」與「建滾壩以播河泄漲」。²⁷ 劉鶚的設計是在河灣要衝處建築與民埝呈小角度的「斜堤」（參圖一），取代與民埝呈九十度角的格堤，並搭配在斜堤與民埝交接點往民埝方向延伸不遠處建築滾水壩。斜堤與滾水壩早已有之，並非劉鶚創新的發明。劉鶚的創新之處在於將民埝、斜堤、滾水壩與大堤四者透過角度的計算整合為一個高效率的水利系統。當大汛從上游往下奔流時，河水漲過灘脊之後馬上遭遇滾水壩受阻。當河水漲過滾水壩流入夾河，就會遭遇臨近的斜堤。因為斜堤的角度，衝擊斜堤的河水一部分會馬上被斜堤「撇溜歸河」。另一部分進入夾河的河水則是沿著斜堤往大堤的方向逆行。逆行的河水漫漫到大堤時，「土得水漬，反藉可固」。隨著河水從滾水壩不斷滾入，黃河的水位與夾河內的水位將達到等高。



圖一：斜堤大意圖²⁸

²⁷ 劉鶚，《劉鶚集》上冊，頁 44-45。

²⁸ 同前引，頁 45。

如此一來，夾河內河水的重量與壓力，反而成為民埝背面的支撐力，幫助民埝抵禦河水大溜對堤防面河一側的衝擊。劉鶚稱之為「水戢」，也就是他所謂的「以水敵水」。同時，隨著河水在夾河中時間一長，河水所攜帶的泥沙也逐漸淤積。一旦河水大汛過去，夾河內已經澄清的水則會隨著黃河河面高度的下降，經由滾水壩流出夾河，回到黃河的正河當中，達到「引清逆淤」的效果，這就是所謂的「以水攻水」。然而，夾河當中村莊甚多，作物面積廣大，讓河水從滾水壩中滾入，村莊和作物難道不會受到災害嗎？劉鶚認為，將河水引入夾河正是為了救村莊與農作物：「初一二年，每年不過略有十餘日之水。三年之後，夾河淤高，水即不能上岸矣。」²⁹ 這一套經由滾水壩將挾帶泥沙的河水洩入夾河，再經由滾水壩將清水注入正河的方法，也就是劉鶚所謂大禹「播為九河，同為逆河」的治河心法的具體化。

劉鶚設計這套斜堤系統是透過流體力學的運作，將原本被視為威脅的河水及泥沙引入夾河之後，轉化為抵禦洪災的力量，甚至是增加農作物生產力的重要資源。劉鶚對於此一系統所帶來的生產力以及對節省經費的效用有著十足的信心。在〈治河五說〉的最後，劉鶚以精確的經費估算來支持他的整套堤防系統的可行性：

顧斜堤之效，已有可考者焉。去年下游總辦候補道李稟請於蒲利之間修築斜堤，宮保張委鶚承辦其事。利津修斜堤一道，蒲台修斜堤一道。後雖因經費不足，高厚未能如式。然二百餘村莊年年浸於水中，而年年振濟者，今已麥秋二季，一律豐收矣。約涸復膏腴之地，可二千餘頃。……聞現在每年歲修四十萬，備料二十萬，恒若不足。倘如此辦法，三年之後，薪水勇糧等項不過二十餘萬，購料買土等項不過十餘萬足矣，每年所省不下二三十萬，而放賑堵口所省之數，不在此內統計。三年之用，不足百萬，而十年之間，約省二三百萬。放賑堵口，又省一二百萬，共省五六百萬，不可謂非至計也。³⁰

對劉鶚來說，治河重要的不只是保全人命，而是既要保全人命又要保護夾河內土地的充分利用以及持續的經濟生產。這是劉鶚「束水攻沙」治河策略背後的重要經濟考量。因此，「束水攻沙」與「不與河爭地」就不只是哪一種方法更可以解決河患

²⁹ 同前引。

³⁰ 同前引，頁 44-45。

的問題，同時也是哪一種方法更符合經濟利益的問題。劉鶚對於斜堤系統所能帶來的農作物生產量、效率與成本的考量，與劉鶚本人對於機械的自動運作原理，以及工業化生產中成本及獲利的計算的濃厚興趣密切相關。劉鶚對高效率自動化的機械生產的興趣充分表現在他的日記當中。³¹ 劉鶚對於斜堤系統在建造成本、生產力以及節費效能上的得意之情，與他在日記中對於機械製造成本、生產力與獲利的計算的反覆強調，在在說明了他對於斜堤系統的設計與 1860 年代以後洋務運動中所強調的機械性生產運作方式相符合。而筆者認為劉鶚強調斜堤系統的生產力，對於我們理解《老殘遊記》如何處理黃河災難創傷具有重要的意義。接下來的一節將探討斜堤系統與小說的洪災創傷療癒書寫之間的關係。

三、創傷、愛情與救贖的地方性

光緒十五年劉鶚因奉河道總督吳大澂之命前往山東測繪《三省黃河全圖》，停留在山東歷城縣小街子村，親眼目睹了黃河水災在一夜之間奪取數十條人命。小說第十四回的回末評語中，劉鶚說自己因此號啕痛哭，並且稱這是他「生平三大傷心事之一」（頁 262）。然而，劉鶚並不是到了 1903 年夏天開始寫作《老殘遊記》時才開始面對這一傷心事。早在 1892 年初，也就是劉鶚在小街子村親歷洪災的兩年半之後，劉鶚其實就已經透過他所擅長的方式來處理他的創傷。

劉鶚在 1892 年初到 1893 年底之間藉由文獻考證繪製歷代黃河河道圖，完成

³¹ 劉鶚於日記中數度提及機械生產相關事件：「申刻，至曾根寓，同往拜日野，看其新式手槍，連發十子，其機甚靈，每分鐘可八十發，及遠一千八百碼，六百碼內能穿薄鐵片。若製造，本銀不過二金，造廠不過三萬金。機器極簡，每一鉤則彈發，一縱則銅殼自出，誠至巧也。」（1902 年 11 月 25 日）「後渡江訪鈴木，觀其造紙機器凡鍋爐四。據云，日燒煤三十噸，引擎五百匹馬力，晝夜不停。薄暮歸，與其工人同杉板。據云，一晝夜出紙三百扛〔打〕弱，每打四包，每包約價五兩餘。原料則稻柴、藍縷二者而已。聞初起只用藍縷。鈴木為之繪圖造機器，始用稻柴，獲利甚豐也。」（1905 年 3 月 8 日）「呼轎赴工藝傳習所。……見織布機器，踏力初起頗費，大約既熟之後，甚不費力矣。因在暑假，各色機器皆收藏，為我取出裝試也。故鐵器樞紐皆鏽澀不靈，然以理揆之，不過半日則靈矣。織毛巾器，全木，有兩格撐軸子，一管緊、一管鬆者。快手一日可織十六條，慢手織八條，大概十條、十二條者居多也。每打費棉紗二十兩。一人不能經紗，大約經紗之功居三之一。如有十人，則每月可出毛巾二千條，為一百六十六打半也。在清淮做則有利，因每打批價一元三角。若上海則必無利，因紗本需五角五分，若批價一元，則一月僅得餘利七十五元，以開支房、飯、工資，必不足也。」（1905 年 7 月 30 日）同前引，頁 713、717、728。

《歷代黃河變遷圖考》。³² 不同於測繪《三省黃河全圖》時是出於吳大澂的命令，《歷代黃河變遷圖考》的撰寫完全是出於劉鶚本人的意願與興趣。接替張曜出任山東巡撫的福潤在向總理衙門推薦劉鶚的奏片中稱包括《歷代黃河變遷圖考》在內的各種劉鶚著作「考據尚屬詳明，有益於用」。³³ 然而，《歷代黃河變遷圖考》具實用性與否其實是個問題。劉鶚在《三省黃河全圖·述意十二條》中指出現有的河圖是由各省吏員依據多年藍本略加更動描畫而成，既不精確也難以統籌。更重要的是，這是因為自咸豐五年黃河改道以來，黃河早已成為一條全新的河。唯有對當下黃河重新進行全面而精細的測繪，「重在知今不在改古」，才能為治河提供可以依賴的基礎。³⁴ 然而，這個「重在知今」的原則卻似乎與他撰寫《歷代黃河變遷圖考》的作法互相矛盾。去考察黃河的變遷史對於治理一條劉鶚所謂「咸豐以來數十年新變之河」的意義何在？特別是相較於劉鶚在 1889 到 1890 年間繪製的《三省黃河全圖》的〈述意十二條〉中附有清楚詳盡的使用與實用價值說明，《歷代黃河變遷圖考》卻完全沒有附上任何說明。此意味著《歷代黃河變遷圖考》的撰作並非來自治河工程上的實用性考量。

那麼，難道劉鶚花費將近兩年時間來撰寫《歷代黃河變遷圖考》只是出自於他的考證癖嗎？筆者認為並非如此。《歷代黃河變遷圖考》考察《尚書·禹貢》到晚清黃河河道變遷之跡，即黃河從遠古到晚清的決堤與改道史，這當中也包括了〈見今河道圖考〉。³⁵ 〈見今河道圖考〉的內容其實與劉鶚三年前完成的《三省黃河全圖》完全相同，而 1889 年山東洪災就是劉鶚在測繪《三省黃河全圖》時發生的。這所謂的〈見今河道圖考〉與其說是考察 1855 年黃河大改道之後的河道，不如說是記錄劉鶚所親歷的 1889 年山東黃河南岸氾濫當時的河道。而 1889 年山東的洪災，亦為劉鶚本人經歷過的 1887 年河南鄭州決口事件的後續效應。換句話說，劉鶚看似出於考據癖所作的《歷代黃河變遷圖考》，其實是他將親眼目睹的兩次重大黃河洪災的個人創傷經驗納入黃河災難史敘事加以定位的嘗試。

至於寫於 1903 年到 1907 年之間的《老殘遊記》，則是劉鶚在《歷代黃河變遷圖考》之外，處理洪災創傷的另一次嘗試。劉鶚在小說自敘中稱「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自敘〉，頁 2）。小說中寫哭泣最多的就是翠環。翠環在小說中的五次痛哭，次數甚至比主人公老殘還多。要討論《老殘遊記》中的創傷書寫，就

³² 同前引，頁 77。

³³ 同前引，頁 47。

³⁴ 同前引，頁 34-35。

³⁵ 同前引，頁 72-77。

必須以翠環作為起點。小說並沒有直接描寫以劉鶚本人為原型的老殘的創傷，而是藉由老殘救助翠環的過程達成劉鶚自身創傷的替代性療癒。本節試圖探討此一透過救助翠環來達成創傷療癒的過程，是否以及在什麼意義上與劉鶚的斜堤系統設計相關。

於十三、十四回中，老殘與黃人瑞在齊東縣等待過河的那一晚招了翠花、翠環作陪。老殘問及翠環的出身及其賣身的經過，翠環卻低頭不語，頻頻落淚。翠花擔心姐妹得罪了客人，於是代翠環說明她的出身與遭遇。翠環家中原是齊東縣富戶，在夾河的灘地上種植大面積的棉花，並且在縣城中經營布店。光緒十五年夏天齊東縣的黃河洪災淹沒了整個縣城，翠環家在夾河中種植的棉花田全被水沖去，她家在縣城裡的棉花店和布店裡的貨也全部被搶去填塞民埕破口。翠環的父親也隨水漂去，留下母親和幼弟。從縣內富戶到家破人亡，也不過短短三天時間。翠環的母親最後因忍不住飢餓，將她賣給妓院，讓翠環從富家小姐淪為妓女。老殘見到翠環身上被妓院老鴇毒打的傷痕並聽見她悲慘的身世心生憐憫，於是決定贖出翠環為妾，並改翠環名為環翠。一日，老殘與環翠同遊泰山，遇見從情欲之苦中解脫得道的尼姑逸雲。老殘遂提議環翠拜逸雲為師，留在泰山的尼姑庵中隨其修行。環翠每次的哭泣都是因洪災所帶來的不幸遭遇而發，而她在小說中最後一次的哭泣，同時也是最後一次的出現，就是老殘向她提出送她去和尼姑逸雲一同修行的建議的時候。老殘贖出環翠並娶她為妾，最後讓她皈依佛門，正是導引她不受控的淚水，使其有依歸之處。隨著環翠的淚水的停止，不受控制的洪水彷彿得到疏通。水患所造成的死難和創傷也得到了安慰與平復。在此同時，作為洪災見證者的劉鶚的創傷也在象徵層面獲得了宗教的救贖。這麼一來，由黃河災難所帶來的創傷與淚水就透過佛法被超越了。有趣的是，環翠在這裡淚如雨下既是因為「提起他家舊事，未免傷心」，同時也是因為已經得到了老殘「這們個主兒，也就離不開了」（頁 455）。我們看到，小說對於黃河洪災創傷療癒的表述，與男女情愛的表述勾連在了一起。更進一步說，身負啟蒙環翠的任務的得道尼姑逸雲，本身就是從男女情欲這點上開悟的。所以，在皈依佛門的過程中被療癒的，除了洪水災難創傷之外，還有男女情感引發的痛苦。

在這裡我們不免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黃河災難創傷療癒會與男女情愛的話語連結在一起呢？一個可能的回答是，這樣的連結之所以必要，是因為一直以來都缺乏談論黃河災難與相關情感經驗的話語形式，而男女之情這一最容易被辨識、操作的情感話語便成了可資運用與調度的表述資源。但是，小說敘事本身是否

有內在的脈絡能讓我們更清楚地說明這個問題呢？第九回桃花山夜談的橋段或許是一個理想切入點。老殘為了幫助城武縣知縣申東造解決縣內治安問題，委請知縣胞弟申子平至桃花山尋訪高人。申子平在途中因借宿偶遇桃花山上的神秘女子璵姑。當晚，申子平與璵姑相對而坐，攜手夜談，在不無曖昧的氣氛下討論著「聖人言情」的問題。這一場夜談當中，璵姑引用〈關雎〉來說明愛情的起源及其合法性，並且以《詩序》中「發乎情，止乎禮義」來說明約束情感流向的必要。〈關雎〉與《詩序》向來是儒家討論情感時援引的重要資源，³⁶ 而將情的「發」與「止」與河水的流動和防堵相類比，也從來就不是新鮮事。例如，宋代朱熹（1130-1200）論《孟子》當中的「七情」時，以「水之流」來釋「情」：「性如水，情如水之流。情既發，則有善有不善。」³⁷ 明代羅倫（1431-1478）在朱熹說法的基礎上對《詩序》的「發乎情，止乎禮義」做如下解釋：「夫性情猶水也，禮義猶防也。水止於防，性情止於禮義，則不流而淫。」³⁸ 基於河水與情感的類比關係，璵姑引「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對於男女情愛的發動與節制的指涉，其實也暗示著對於黃河的氾濫與治理。³⁹

小說將作為男女情愛話語根源的《詩經》，以及黃河災難創傷療癒連結在一起的另一個例子，則是老殘（或者說是劉鶚自己）的題詩。小說第十二回，老殘因「看見凍河很想做詩」，所以在旅店壁上題了一首五古：

地裂北風號，長冰蔽河下。後冰逐前冰，相陵復相亞。
河曲易為塞，嵯峨銀橋架。歸人長咨嗟，旅客空歎咤。
盈盈一水間，軒車不得駕。錦筵招妓樂，亂此淒其夜。（頁 228）

這首詩寫旅途受阻於黃河凌汛，招妓作樂以消磨永夜。第九、十句「盈盈一水間，軒車不得駕」化用自《古詩十九首·迢迢牽牛星》的「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

³⁶ 關於儒家的情感研究，見李明輝，《四端與七情——關於道德情感的比較哲學探討》（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

³⁷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59，頁1381。

³⁸ 羅倫，〈敬菴詩集序〉，收入黃宗義編，《明文海》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259，頁2716b。

³⁹ 有意思的是，劉鶚在實際治河的論述中，用以比喻水流的是「性」而非「情」。這顯然是承襲自《孟子》中孟告之辯中以水流喻性的說法，而非理學家以水流喻情的說法。劉鶚在1889年的〈治河五說〉當中批評山東巡撫幕僚持賈讓「不與河爭地」之說，以為「是誤以縱水為順水，猶之人以任性為率性也」，就是以人性比喻水性。劉鶚，《劉鶚集》上冊，頁39。

語」。而〈迢迢牽牛星〉中「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以及「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等句則是化用《詩經·大東》的「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之意。換句話說，劉鶚這首五言古詩的源頭其實是《詩經·大東》。有意思的是，當老殘觀凍河回旅店途中，抬頭觀星感嘆流淚時所想到的「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句（頁 221），也是出自《詩經·大東》。觀黃河有感所引、所作之詩皆與《詩經·大東》有關，並非毫無來由。《詩序》稱「〈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⁴⁰ 譚國所在為今山東濟南。雖然《詩序》中的「困於役，而傷於財」指的並不是山東水患，但是《詩序》中的這一說法一旦挪用到晚清的歷史脈絡中，卻恰恰好成為了山東在黃河改道後所經歷的頻繁水災、過重勞役及財務困難的真實寫照。

老殘觀黃河有感所得的詩句溯源到《詩經》，本身就具有起源論上的意義。《詩經》被視為中國詩歌傳統的起源，而《詩經》的首篇〈關雎〉的第一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當中用以起興的「河」，指的就是黃河。在這個意義上，黃河不僅是《詩經》開篇之作的首要意象、男女情感表達所運用的初始意象，也是詩此文類的歷史及地理起源。小說中老殘的題詩不只是寫眼前所看到的黃河，寫黃河引起的情感，同時是透過溯源古詩與《詩經》的用典，來為老殘（以及劉鶚自己）因黃河所引發的情感標定其歷史以及表述方式的根源。透過男女情愛的話語來調動關於黃河洪災創傷的論述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兩者其實是同源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桃花山談情」這一小說中最具男女情感色彩，同時也是對於我們理解小說情感論述最為關鍵的場景，是在黃河洪災以及劉鶚的黃河治理經驗作為小說寫作脈絡的基礎上才能成立的。這要從申子平和璵姑這兩個人物的原型意義談起。夏志清早已指出申子平是為了作為老殘——劉鶚本人在小說中的自我投射——在敘事上的替身而存在。⁴¹ 另一方面來說，小說同時又將老殘與大禹聯繫了起來。小說開頭，老殘就主張要醫治黃瑞和（黃河）的病必須用「大禹傳下來的方法」（頁 8），而老殘與山東巡撫莊宮保談論治河策時，又再次力主王景「從大禹一脈下來」的方法（頁 53）。小說對於老殘與大禹之間關係的刻意強調的確是不可否認的。在象徵的層面上，作為老殘在敘事上替身的申子平，也從老殘那裡繼承

⁴⁰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阮元審定，盧宣旬校，《毛詩正義》，《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 2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刊本），頁 437b。

⁴¹ Hsia C. T., "The Travels of Lao Ts'an: An Exploration of Its Art and Meaning," pp. 40-68.

了大禹傳人的身分。那麼瓊姑又是誰呢？不同於申子平，過去學者對於神秘但又是小說中理想女性典型的瓊姑究竟是誰有不同看法。有學者從劉鶚的學術人脈網絡中尋找瓊姑的原型。劉鶚為晚清儒學教派太谷學派門人。太谷學派分南北兩宗，劉鶚為南宗傳人李光炘（1808-1885）的弟子。⁴² 據學者考證，桃花山的原型應是太谷學派北宗張積中（?-1866）聚眾講學之山東黃崖山，而瓊姑的原型則是李光炘姪女，小名瓊姑的李素心。⁴³

然而，即便小說運用實際歷史人物作為其虛構人物的原型，也並不意謂我們只能進入小說所指涉的那個外在的歷史世界，並且只能從那裡去獲得詮釋小說的正當性。正好相反，小說的藝術的奧妙正在於小說家藉由改造現實歷史的材料，創造出屬於文本內部的象徵。事實上，劉鶚在小說中將瓊姑的姓氏從李姓改為塗姓，恰恰就是這一象徵的創造手法。塗氏相傳為夏塗山氏之後，⁴⁴ 根據神話傳說，大禹於治水期間遇塗山氏之女於塗山。從小說人物關係來看，瓊姑與作為老殘敘事替身的申子平之間是一種看似「不及於亂」的啟蒙者與被啟蒙者的關係，但是卻又毫無疑問地是相互愛慕／曖昧的情愛關係。申子平作為大禹傳人老殘的替代人物，與大禹妻子塗山氏的後代塗仲瓊在深山夜半握手談情，恐怕是再適當不過的了。子平和仲瓊兩人在桃花山品茗談情，一方面開啟了小說中對於男女情感的討論，另一方面則暗示了小說中老殘（或應該說劉鶚自己）作為治水英雄的定位。有趣的是，傳說中大禹的妻子塗山氏的名字有不同的說法，其中一個名字是「女媧」，⁴⁵ 也就是補天治水的女神。⁴⁶ 將補天治水的上古女神女媧嫁接到夏禹的妻子塗山氏的例子，文獻上早已有之。《老殘遊記》沿用這條對於神話人物關係的解釋系譜，將女媧與塗山氏的身分結合在一起，賦予瓊姑一個既是大禹之妻，又是補天治水女神後代的身分。換句話說，第九回瓊姑在桃花山對申子平談情的發動與節制，其實就是大禹

⁴² 關於太谷學派的研究，見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2003），頁 39-60。

⁴³ 盛成，〈關於《老殘遊記》〉，《清末小說研究》，7（天津：1983），頁 10-19。

⁴⁴ 「塗，南昌郡系出瑩山氏塗山村之女名嬌〔嬌〕，妻禹生啟，以國戚封姓涂氏。」熊峻運，《增補姓氏族譜箋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清雍正二年（1724）裕元堂藏版），卷 8，頁 25a。

⁴⁵ 《史記正義》引《帝繫》：「禹娶塗山氏之子，謂之女媧，是生啟。」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第 1 冊（臺北：鼎文書局，1981），卷 2，〈夏本紀〉，頁 81。

⁴⁶ 女媧不只是補天的女神，同時也是治水的女神。《淮南子·覽冥訓》：「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熾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鷙鳥攫老弱。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劉安撰，劉文典注，馮逸、喬華點校，《淮南鴻烈集解》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卷 6，〈覽冥訓〉，頁 206-207。

之妻、補天治水女神後代對大禹傳人談情的發動與節制。因此，這裡男女之情的發動與節制與黃河的氾濫與治理的歷史源頭的密切連結，不只來自於《詩經》，同時也來自於母神與洪水神話。

男女情感與黃河洪災之間在儒家經典與上古傳說層面上緊密的連結，解釋了為什麼小說敘事在處理洪災創傷時必然連帶著處理男女情感。而「桃花山談情」一回中的一首七言絕句則讓我們理解劉鶚的斜堤設計如何影響了小說對這兩種情感的處理。第九回開頭，申子平在璵姑家中牆上讀到的一首由黃龍子所作的七絕詩：「情天慾海足風波，渺渺無邊是愛河。引作園中功德水，一齊都種曼陀羅。」（頁154）雖然璵姑說這是黃龍子「不拘三教，隨便吟咏」，但是就如申子平自己所說，這首關於處理男女情欲的詩確實「有許多佛家的典故」。比劉鶚稍晚的著名佛教居士丁福保（1874-1952）在其《佛學大辭典》中如此解釋「愛河」：「愛欲溺人，譬之為河。又貪愛之心，執著於物而不離，如水浸染於物，故以河水譬之。」⁴⁷「功德水」則是指佛之淨土八功德池中澄澈、甘美、潤澤的好水。⁴⁸至於「曼陀羅」即《法華經》中「佛說法，天雨曼陀羅華」的「曼陀羅華」，亦佛陀入定時從天而降的四種天花之一。⁴⁹黃龍子這首七絕講的是男女情欲的處理與轉化：將無邊的愛河之水導引入園中成為功德水，用以栽種長養象徵智慧的曼陀羅花。這一首佛教意味濃厚的關於男女情感的詩看似平常，但是卻象徵並預示了小說對於黃河災難創傷的處理。

有意思的是，就在小說二編第七回，也就是老殘安排環翠上山學佛之後緊接著的一回當中，我們看到了引功德之水種出來的曼陀羅花：

⁴⁷ 丁福保編，《佛學大辭典》（臺北：華藏淨宗學會，2012），「愛河」，頁2352a。

⁴⁸ 「（術語）極樂之池中及須彌山與七金山之內海，皆盈滿八功德水。《無量壽經》上曰：『八功德水湛然盈滿，清淨香潔，味如甘露。』《稱讚淨土經》曰：『何等名為八功德水？一者澄淨，二者清冷，三者甘美，四者輕軟，五者潤澤，六者安和，七者飲時除飢渴等無量過患，八者飲已定能長養諸根四大增益。』《俱舍論》十一曰：『妙高為初，輪圍最後，中間八海。前七名內七中皆具八功德水：一甘，二冷，三軟，四輕，五清淨，六不臭，七飲時不損喉，八飲已不傷腸。』」同前引，「八功德水」，頁135b-135c。

⁴⁹ 「（雜語）法之奇瑞。自天降曼陀羅華也。《法華經·分別功德品》曰：『佛說是諸菩薩摩訶薩得大法利時，於虛空中，雨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以散無量百千萬億寶樹下師子座上諸佛。』《佛說阿彌陀經》曰：『晝夜六時，雨天曼陀羅華。』」又「（術語）梵音 Mahāmandārava，譯曰大白蓮華，四華之一。」同前引，「雨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頁1249a、2579b。又《妙法蓮華經·序品》曰：「佛說此經已，結加趺坐，入於無量義處三昧，身心不動。是時天雨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曼殊沙華、摩訶曼殊沙華，而散佛上，及諸大眾。」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大正新修大藏經》第9冊（臺北：新文豐出版，1983），卷1，頁2b。

話說德慧生携眷自赴揚州去，老殘卻一車逕拉到淮安城內投親戚。你道他親戚是誰？原來就是老殘的姊丈。這人姓高名維，字曰摩詰。讀書雖多，不以功名為意。家有田原數十頃，就算得個小小的富翁了。住在淮安城內勺湖邊上。這勺湖不過城內西北角一個湖，風景倒十分可愛。湖中有個大悲閣，四面皆水；……。這高摩詰在這勺湖東面，又買了一塊地，不過一畝有餘，圈了一個槿籬，蓋了幾間茅屋，名叫小輞川園。把那湖水引到園中，種些荷花，其餘隙地，種些梅花桂花之類，卻用無數的小盆子，栽月季花。這淮安月季，本來有名，種數極多，大約有七八十個名頭，其中以藍田碧玉為最。……。進了廳門，只見那高摩詰正在那裏拜佛。當中供了一尊觀音像，面前正放著那盆藍田碧玉的月季花。

（頁 467-468）

老殘拜訪家住淮安的姐夫高維。⁵⁰ 高維字摩詰，蓋的園子叫「小輞川園」，用的是王維的典，殆無疑義。淮安勺湖歷來是佛教勝地，湖中有閣名大悲閣。小說中描述從這大悲大憫的湖中所引出來的水不只種出荷花、梅花、桂花，更重要的是種出了藍田碧玉的月季花。淮安向來以月季花的栽種聞名。月季花與被稱作曼陀羅花的山茶花開花時極為相似，⁵¹ 非細察難以分辨。高摩詰引大悲閣座落於其中的勺湖湖水種月季花，可說是將黃龍子「引作園中功德水，一齊都種曼陀羅」一句以敘事的方式表達出來：無論環翠因黃河洪災家破人亡而淌的眼淚，或者因與老殘分離，「心上好像有萬把鋼刀亂扎一樣」而流的眼淚，甚至是劉鶚自己的眼淚，都引作了具有生產力的，用以澆灌園中曼陀羅花的「功德水」。男女情欲與黃河災難創傷經過佛法的轉化之後，就被引入了這塊佛田之中發揮它在精神啟蒙與超越層面上的生產力。

引愛河水入園中種曼陀羅，以及引勺湖中水入園種月季花這兩個意象，明顯呼應了劉鶚的斜堤系統所強調的，將原本具威脅性的河水引入夾河並轉化為生產資源的運作機制。誠然，這兩個引水灌園的意象並不是沒有差異。黃龍子的七絕詩當中用以灌園的是河水，但小輞川園的描述中卻是湖水。以湖水灌園看似與斜堤系統所

⁵⁰ 小說中老殘的姐夫是以劉鶚自己的姐夫淮安府山陰縣人高德銘（字維之）為原型，至於是否有園名「小輞川」則待考。

⁵¹ 「山茶，一名曼陀羅樹，高者丈餘，低者二三尺，……，以葉類茶，又可作飲，故得茶名。」王象晉，《群芳譜》，《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 80 冊（濟南：齊魯書社，2001，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頁 693a-693b。

強調的轉化河水的運作方式並不相類。但是，筆者認為正是這個差異才更加說明了小說對於小輞川園的描述與斜堤系統的密切關聯。淮安的勺湖本身雖並不與黃河連接，但是其實位於與黃河有重要關係的洪澤湖附近。明清時期由於黃河奪取淮河的緣故，黃河所挾帶的泥沙從淮安清口進入了與淮河連接的大運河河道，嚴重影響漕運。明萬曆年間潘季馴與清康熙年間靳輔都選擇在淮河東南岸構築堤壩，攔蓄來自淮河的清水使之水位提高，形成了廣闊的洪澤湖，之後再引湖中清水注入黃河河床刷帶泥沙。洪澤湖在 1855 年黃河改道北流之前一直是黃河整治工程中最關鍵的地點。⁵² 小說中寫淮安高摩詰引勺湖水灌園種植，很難不令人聯想到以位在其鄰近，但遠為巨大的洪澤湖為中心的黃淮治理工程。而我們不要忘記，劉鶚的斜堤系統的設計原理，恰恰是從潘季馴與靳輔在洪澤湖實施的治河工程方法演變而來的。我們甚至可以說，《老殘遊記》關於黃河洪難創傷的敘事方式，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劉鶚的斜堤系統的設計，甚至是三百餘年的淮安黃河治理工程史所形塑。在這個意義上，技術就不只是傳達情感，同時也在最基礎的層面上成為了情感的重要組成。

理解淮安這個地點對劉鶚個人的重要性，不只幫助我們更清楚地說明劉鶚的斜堤系統與《老殘遊記》中黃災受難者創傷療癒敘事之間的關係，同時也是我們理解小說將佛教式的證悟連結到黃災受難者創傷療癒這一敘事邏輯的重要脈絡。如上所述，帶有明顯佛教意味的小輞川園中的月季花，象徵了黃災受難者的創傷療癒與超越。然而，小說敘事透過佛教式證悟來超越黃河洪災創傷，並不只是單純因為佛教思想原本就提供了超越苦難的體證模式。小說中這一敘事的安排其實與劉鶚自身出身以及他作為黃河河工技術專家的背景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小說寫月季花不只是關於月季花本身，也是關於淮安——自古以來月季花的著名產地，同時也是 1855 年黃河改道以前黃河整治工程的中心。這兼具月季花產地以及運河整治工程關鍵地意義的淮安，其實就是劉鶚的家鄉。原籍丹徒的劉鶚在 1877 年，也就是他二十一歲這一年定居淮安勺湖東南。劉鶚在淮安的宅子是 1866 年姐夫高維之代為購買。⁵³ 劉鶚此後雖然四處奔波，但仍以淮安為長居之地。小說中的小輞川園是老殘姐夫的家，其原型卻是由姐夫代為購買的劉鶚自宅。如同外出治水十三年後功成回家的大禹，小說中身為大禹傳人的老殘在安頓好了黃河洪災災民環翠之後回到家鄉淮安。老殘這一趟回家象徵了河水最終得治，雖然實際上 1855 年黃河改道使得流經淮安

⁵² 關於潘季馴及靳輔兩人治水方法的考察，見蔡泰彬，《晚明黃河水患與潘季馴之治河》（臺北：樂學書局，1998），頁 376-382；林天人，〈清初河防政策與河工研究：以靳輔的治河為考察重心〉，頁 93-122。

⁵³ 劉德隆、劉瑀，《劉鶚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9），頁 59、137。

的運河水量銳減，河運因此幾近停擺，甚至於完全喪失功能。小說將盛開於小輞川園中的月季花賦予了佛教的意涵，誠然可以被理解為劉鶚在處理黃災受難者創傷這個問題上走了一條傳統的佛教證悟的路子。但是，這一條路徑的選擇並不是偶然的，或者僅只是出於劉鶚個人對於佛學的興趣，而是因為在象徵的層面上要讓「大禹回家」的主題成立的地點唯有盛產月季花的淮安。

四、從災民到同胞

上一節主要探討《老殘遊記》的創傷療癒書寫與黃河整治工程與技術之間的關係。這一節則要進一步討論《老殘遊記》的洪災創傷療癒書寫與晚清國族認同形塑之間的關係。過去學者探討晚清小說與國族認同的關係時特別注意到的《老殘遊記》自敘中的哭泣說，對於我們討論《老殘遊記》中的洪災創傷與國族創傷的書寫仍然不失為一個理想的切入點：

《離騷》為屈大夫之哭泣，《莊子》為蒙叟之哭泣，《史記》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詩集》為杜工部之哭泣；李後主以詞哭，八大山人以畫哭；王實甫寄哭泣於《西廂》，曹雪芹寄哭泣於《紅樓夢》。王之言曰：「別恨離愁，滿肺腑難陶洩。除紙筆代喉舌，我千種相思向誰說？」曹之言曰：「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意！」名其茶曰「千芳一窟」，名其酒曰「萬豔同杯」者：千芳一哭，萬豔同悲也。吾人生今之時，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國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種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鴻都百鍊生所以有《老殘遊記》之作也。棋局已殘，吾人將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吾知海內千芳，人間萬豔，必有與吾同哭同悲者焉！（〈自敘〉，頁 1-2）

學者探討《老殘遊記》中情感論述與晚清政治的關係時，最常引用的就是自敘中的「棋局已殘，吾人將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多數學者把它理解為劉鶚「國是如此，丈夫何以家為」的憂心傷逝之嘆。在這樣的解讀下，「殘」指的是國家氣數將盡，事不可為。這樣的讀法當然是成立的。但是，這篇敘的結尾，「吾知海內千芳，人間萬豔，必有與吾同哭同悲者焉」，其實提示我們從小說史的角度理解「殘」這個概念。「海內千芳，人間萬豔」化用的是《紅樓夢》「千紅一窟」、

「萬豔同杯」的典故。以《紅樓夢》典故作整篇敘言的結尾，可見《紅樓夢》對於理解這篇敘的重要性。劉鶚接著又引《紅樓夢》首回的「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意〔味〕」一詩。除了《紅樓夢》之外，沒有任何其他自敘中提及的前代經典獲得這樣的待遇。我們因此可以毫不懷疑地說，劉鶚意圖暗示《老殘遊記》是上接《紅樓夢》而來的。

我們該如何理解劉鶚將《老殘遊記》連結上了《紅樓夢》的譜系？《紅樓夢》與《老殘遊記》之間內在的關聯是什麼？小說一開頭說明老殘這個號的由來，其實就已經提供了重要的線索了。老殘「原姓鐵，單名一個英字，號補殘；因慕懶殘和尚煨芋的故事，遂取這『殘』字做號。」（頁 7）老殘姓鐵名英，「鐵英」一詞指的是石中的純鐵。而根據《甘澤謠》，懶殘和尚是因為「性懶〔懶〕而食殘」得其號。⁵⁴「食殘」指的是他吃眾僧吃剩的殘餘食物。所以，這裡的「殘」字指的是殘留、剩餘之意。而正如讀者所熟知的，《紅樓夢》所講述的「自怨自愧，日夜悲哀」的頑石，就是女媧補天所用的三萬六千五百零一顆頑石中殘餘的那一顆。當我們將《老殘遊記》的「補殘」放在《紅樓夢》女媧煉石補天的譜系當中，就會發現劉鶚是渴望成為用來補綴天之殘缺，但最後卻被遺留不用的那塊自怨自愧、日夜悲哀的石頭。劉鶚以「補殘」為小說主角之號，其實表現了劉鶚自恨無才補蒼天、無用於天下的感嘆。但是，如果我們回到女媧神話，就會發現「補殘」或許有著更為具體的指涉。治水是女媧補天工程當中最重要項目之一，所以劉鶚這顆棄而未用的頑石所欲補者就不盡然是抽象的「天下」，同時也是流溢氾濫成災的河水與淚水奔瀉而出的河堤決口。《老殘遊記》自敘一方面訴諸身世、家國、社會、種教的感情與淚水，一方面則藉由引用《紅樓夢》將自身嫁接到女媧補天神話中治河的主題，將國族認同與黃河洪災創傷及療癒聯繫起來。

劉鶚在 1905 年為《老殘遊記》初編所寫的自敘對於國家、社會以及種教的情感認同的強調，其實仍然是植根於劉鶚對於治理黃河洪災創傷與療癒的關懷。然而，《老殘遊記》所再現的創傷與療癒究竟是誰的創傷，又是誰的療癒呢？與這創傷與療癒聯繫的又是誰的認同呢？雖然小說似乎是透過相當個人層面的佛教修行路徑來處理黃河洪災所造成的個人創傷，但是我們若把老殘將環翠從妓院贖出並送往尼姑庵修行的過程放在晚清災難救助的脈絡下來看，就會發現這一創傷療癒的書寫是有其深刻的社會性基礎。

⁵⁴ 「懶殘者名明攢，天寶初衡岳寺執役僧也。退食即收所餘而食。性懶而食殘，故號懶殘也。」袁郊，《甘澤謠》（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5。

洪災創傷並非僅限於個人經驗，而是集體經驗。如同地震與旱災，洪災是將大範圍地區內所有人一齊捲入的集體事件。但是，洪災的致命程度卻又是其他種自然災難所難以比擬的。1887 年黃河鄭州段決口所造成的水災，至少九十萬人死亡。這樣的創傷經驗不只具有集體性，同時還具有社會性。如此大規模傷亡的災難不可能單由國家的救災體系來應對，特別是當災害發生時官方賑災必須經歷地方上報、勘查、分級與施賑等程序，一來一往間往往錯失了救災賑濟的最佳時機。這時候，賑災工作很大一部分就必須藉由民間社會所發展出來的救助體系來承擔，而民間義賑也就成為十九世紀中後期維持中國地方社會秩序極為重要的手段。⁵⁵

《老殘遊記》寫老殘幫助環翠一事，即是這一社會救助行動的例子。十九世紀中期因頻繁水旱災所造成的大規模飢荒的記載中，最常看到的現象即是婦女被家人賣至娼寮淪為娼妓。一如小說中對於環翠的描寫，關於飢荒區女性報導中最為顯著的主題，就是人口販子施加於女性身體上的凌虐。《申報》、《桃花塢年畫》以及當時的英文報紙中不斷出現飢荒地區的婦女人口販賣事件，以至於沿海省分具社經影響力的仕紳開始將拯救因飢荒受難的女性與拯救中國連結起來。將遭遇飢荒的女性從人口販子手中拯救出來，成了中國沿海富裕地區菁英仕紳對抗飢荒，以及對抗來自外國對於中國的嚴厲批判所能採取的手段。在這賑濟的過程中，寺廟則常成為辦賑的善士們救援並安置被家人販賣給妓院的女子們的重要基地。⁵⁶《老殘遊記》中環翠之所以淪為妓女，即是因為她的母親在水災後的飢荒的生存壓力下將她賣給了老鴇。老殘則是扮演救濟被賣至妓院的女性的善士角色。劉鶚對於辦賑具有豐富的經驗。眾所周知，劉鶚曾於庚子事變時，籌款向俄軍買下被佔領的北京太倉賑濟難民，並投入北京的辦賑與掩埋罹難者屍體的工作。⁵⁷在此之前，劉鶚也曾於 1894 年 3 月奉山東巡撫福潤的委託在山東辦理水災賑捐。⁵⁸環翠最後跟隨尼姑逸雲上山學佛的橋段，呼應了十九世紀後半因應飢荒而起的義賑行動中佛教寺廟所扮演的安頓災民的角色。換句話說，小說中老殘將環翠拉出火坑，最後送往泰山隨逸雲學佛的安排，其實就是晚清地方仕紳透過賑濟手段，救助因天災造成的飢荒而遭販賣的女性的典型例子。

⁵⁵ 朱澐，〈地方社會與國家的跨地方互補——光緒十三年黃河鄭州決口與晚清義賑的新發展〉，《史學月刊》，2（開封：2007），頁 104-112。

⁵⁶ Kathryn Edgerton-Tarpley, *Tears from Iron: Cultural Responses to Famin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pp. 159-196.

⁵⁷ 劉德隆、劉瑀，《劉鶚年譜長編》，頁 387-388。

⁵⁸ 同前引，頁 287。

小說以救贖黃河洪災的女性災民作為其創傷書寫的主要情節，當然與晚清的義賑活動以及劉鶚自身豐富的賑災經驗有相當密切的關係。但是，這段情節的意義遠不止於此。正如我們在小說自敘中所見到的，劉鶚是在晚清個人與社會、國家、種教的關係的脈絡中討論傷痛情感的力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段創傷療癒的情節其實無法脫離晚清情感認同形塑的脈絡來理解。文化創傷理論或許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有效的切入角度，以理解這段創傷療癒的情節與情感認同形塑之間的關係。文化創傷理論主張集體創傷並非自然而然的存​​在，而是社會建構的事物。創傷之所以成為創傷，是透過能動者 (agent) 的中介被再現與建構而成。換句話說，創傷不是群體經驗痛苦的結果，而是痛苦被再現並進入了集體認同感核心的結果。在各種作為能動者的個人、組織或社會群體的中介之下，社會將會辨認出創傷的根源，擔負起道德責任。集體的成員以此界定他們的群體關係，以分擔他人的苦難。當這些人認定了他人的苦難也是自己的苦難時，社會便擴大了「我們」的範圍。⁵⁹

從這樣的角度出發，我們可以提問：有哪些能動者參與建構黃河洪災創傷？這建構又是透過什麼樣的方式達成的？《老殘遊記》二編的出版為我們提供了說明上述問題的絕佳例證。1907 年 5 月劉鶚赴北京籌劃創辦自來水、電燈、電車等事，最後並未成功。然而，這時人在北京的劉鶚受到友人方若 (1869-1954) 之請寫作《老殘遊記》二編，並在其主編的天津《日日新聞》上連載。六、七月間劉鶚開始了《老殘遊記》二編的撰寫，並從 8 月 18 日開始在天津《日日新聞》上連載。⁶⁰ 與此同時，北京與天津所在的直隸發生了嚴重的水災。同年 8 月 4 日永定河河水泛漲導致多處決口氾濫。⁶¹ 十九世紀當中，永定河氾濫有三次河水沖入北京城，七次衝入天津。離 1907 年最近一次洪水沖入北京與天津的時間分別是 1893 及 1896 年。⁶² 1907 年夏天永定河氾濫，雖然是外圍州縣受損較重，沒有對北京與天津造成重大的災害，但是對十年前才有過慘痛經驗的北京與天津的居民而言必然喚起了令人恐懼的回憶。《老殘遊記》二編第六回老殘將環翠送入尼姑庵學佛修行的救贖情節，剛好就是刊載於永定河氾濫期間的 1907 年 9 月 30 日到 10 月 9 日之

⁵⁹ Jeffrey C. Alexander et al.,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Berkeley/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p. 1-30.

⁶⁰ 劉德隆、劉瑀，《劉鶚年譜長編》，頁 668。

⁶¹ 光緒三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1907 年 8 月 4 日）永定河水勢陡漲，造成多處漫口，同年十月初七日（1907 年 11 月 12 日）合龍。趙爾巽等，《清史稿》第 4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 24，〈德宗本紀二〉，頁 959-960。

⁶² 姚魯烽，〈全新世以來永定河洪水的發生規律〉，《地理研究》，10.3（北京：1991），頁 64。

間。⁶³ 而這正是民間商會為永定河水災募款賑捐如火如荼進行的時刻。⁶⁴

儘管這次永定河水災對天津影響不大，但卻是當時天津《日日新聞》的讀者所共同擁有的經驗。1907 年 8 月下旬於天津《日日新聞》上和連載《老殘遊記》的同一版面上，刊登了數則因永定河氾濫而發起的賑災活動的廣告，以及壽險以及水火災險的廣告。⁶⁵ 自 1870 年代以來，以《申報》為代表的大眾報刊在民間義賑當中就扮演了訊息傳遞的角色。⁶⁶ 晚清知識人對於報刊媒體在引發非災區民眾對於

⁶³ 劉德隆、劉瑀，《劉鶚年譜長編》，頁 673。當然，小說刊載的時間並不見得就等同於寫作時間。但是，若以劉鶚大約八至九日刊完／寫完一回的速度來推斷，從劉鶚於 1907 年 6、7 月間開始撰寫到第五回寫作結束，至少也要超過四十日的時間。換句話說，即便劉鶚是在 1907 年的 7 月初開始《老殘遊記》二編的寫作並持續穩定進行，那麼刊載於 9 月 30 日到 10 月 9 日之間的二編第六回的救贖情節，其寫作時間也極可能與八月下旬開始的永定河洪災重疊。

⁶⁴ 這次水災直隸武清、寶坻兩縣受災最為嚴重。直隸總督袁世凱命令賑撫局傳諭商會緊急放賑，商會派會董至武清、寶坻查明被災急貧戶，按大口發銅錢 1 吊小口減半覈實發放賑款。在武清縣 19 村共救濟災民 3621 戶，大口 4828 人，小口 4401 人，發放銅元 7028.5 吊。寶坻縣 32 村救濟災民 3227 戶，大口 5385 人，小口 5222 人，發放銅元 7996 吊。救災款均由商會募集。當年冬天，商會在災區發放冬賑，由商會募集銅元 10009 吊，賑撫局撥給棉衣 200 套共 400 件，在寶坻、天津、寧河、武清四縣所屬 43 村共查放災民 4839 戶，大口 7027 名口，小口 5964 名口，均按大口銅元 1 吊、小口 500 文發放。天津市檔案館等，《天津商會檔案匯編（1903-1911）》下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頁 2137-2142。

⁶⁵ 「丹桂戲園開演新戲籌辦直隸水災賑捐：近日永定河決口成災數百里廬舍淹□□□□□離，慘苦萬狀。諸大善士議將江北賑捐□□□□賑撫局、商務總會前往散賑。奈地方廣大，人民眾多，待哺嗷鴻滿曠野。大有杯水車薪之勢。本全人等義切同胞□□議定於本月十一、十二兩日白晝演戲，兩天所入票價全數充賑。前後台夥友及房主平安公司皆盡義務，不取分文。□□君子屆時早降以襄善舉是幸是禱。」（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初十日〔1907 年 8 月 18 日〕）「戲法助賑：啟者朱連魁第一班戲法遊歷西洋各國賽會，無不稱讚神奇奧妙，生面別開。蒙告國給以文照併得各國賞賜寶星金表多件，回華後歸鄉置買莊田，安分度日。近日直隸河決成災，十數州縣，慘苦萬狀。諸贊成員特邀出朱君演術助賑。朱君慨然允許，不取分文，併邀來一特別小人，身高二尺上下，年七十餘歲，亦可奏技□□□□朱君邀出本班各奇巧藝術人位幫助。俟擇定開演地址日期再行布告。所有收入之款全數充賑，並不扣一文開消。此聲明 徐樸菴、張紹五、馬少華、甯星普、劉子良、劉伯年、土挹清、英斂之 同啟。」（光緒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1907 年 8 月 31 日〕）「永年保壽公司：啟者本公司設在天津英租界中街廿六號門牌。北京東長安街牌樓路北二□□□□□便接待主顧。本公司調查去歲所作之生意較諸他公司十分興旺，其保壽一□程實有裨益於諸君。如欲此刻保壽，即於此刻起算便能獲利。凡已在本公司□□之公司股份人。倘蒙諸君賜顧請 駕臨面議可也。」（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初十日〔1907 年 8 月 18 日〕）「瑞記洋行保險廣告：本行經理火險歷有年所，價值公道，賠款迅速，久已遐邇馳名。凡有街□□館住在以及各貨等類，並由天津裝運各埠，貨物一切水險兼人壽保□□□本行承保。如願意者請移 玉至本行軍械帳房，向王君芙亭面議可也。」（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十五日〔1907 年 8 月 23 日〕）劉鶚，《老殘遊記》二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圖書館藏天津《日日新聞》本），無頁碼。

⁶⁶ 在「丁戊奇荒」最嚴重的 1877-1878 年間，《申報》發表關於賑災的論說 245 篇，佔當時論說總量的百分之三十。陳樺、劉宗志，《救災與濟貧——中國封建時代的社會救助活動（1750-1911）》

災民的同情上的作用，早已有敏銳的觀察。鄭觀應 (1842-1922) 曾如此說明報館在救荒過程中的功效：「夫報館之設，其益甚多。……。各省水旱災區遠隔，不免置之，膜視無動於中。自報紙風傳，而災民流離困苦情形，宛然心目。於是施衣捐賑，源源挹注，得保子遺，此有功於救荒也。」⁶⁷ 然而，處理洪災創傷的小說與水災助賑的廣告在報紙同一版面上出現，這無疑是第一回。其中「丹桂戲園開演新戲籌辦直隸水災賑捐」的賑災廣告特別強調賑捐的發起人「義切同胞」。另一則「戲法助賑」的賑災廣告則以當時被視為中國對外最具代表性的魔術師朱連魁 (1854-1922?) 為號召。朱連魁於 1898 年赴美國演出，以傳統中國戲法風靡美國觀眾。並且為了揭穿當時在倫敦假冒為中國人的美國魔術師 William Ellsworth Robinson (1861-1918)，朱連魁於 1905 年遠赴英國倫敦，向其冒牌血統提出挑戰。⁶⁸ 因此以朱連魁為號召的助賑具有高度的國族層次的象徵意義。天津《日日新聞》這樣的版面安排，很難不把它看成是曾任永定河河工委員的主編方若刻意為之。然而，《老殘遊記》的創傷療癒書寫與報紙上義賑的廣告共享一個版面，並不只意謂 1907 年 8 月初的永定河氾濫以及其後的各種民間賑濟行動是小說的洪災創傷療癒書寫的社會脈絡，甚至也不只是說明劉鶚在《老殘遊記》連載過程中有可能是有意識地與刊登於同一版面的賑災活動的廣告相互回應或挪用。如果我們將報紙上的版面放在一起看（這也是報紙讀者常見的閱讀行為），就會發現報紙透過版面的安排生產出一套由小說敘事、地方仕紳助賑的廣告以及保險公司的廣告所共構的，關於洪水災難救助的話語。這一套災難救助的話語包括了天災的慘況與其不可預測性所帶來的恐懼，對受難國人同胞的無私憐憫之情，以及象徵性的創傷療癒過程。

《老殘遊記》二編在天津《日日新聞》上的連載，同時召喚了讀者對 1907 年直隸永定河決口與 1889 年山東黃河南岸氾濫的同情共感。小說讀者們在因永定河決口的報導與賑災廣告而對永定河氾濫災民「流離困苦情形宛然心目」的同時，也進一步認識了小說所寫的 1889 年山東齊東縣洪災慘事。他們對於當下直隸水災災民能夠產生同情，也因此無法對小說所描寫的十八年前山東難民的痛苦無動於衷。換句話說，《老殘遊記》二編中的黃河洪災創傷敘事，透過連結當下與過往的災難現場，為當時的讀者建構了 1889 年到 1907 年之間的集體並連續的創傷記憶，以及基於對此創傷的共感所產生的「同胞」認同。因此，與保險及助賑廣告共享報紙版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頁 407。

⁶⁷ 鄭觀應著，辛俊玲評注，《盛世危言》（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日報上〉，頁 143。

⁶⁸ Frank Cullen et al., *Vaudeville Old & New: An Encyclopedia of Variety Performers in America*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 222-225.

面的《老殘遊記》的創傷療癒書寫，就不只是關於某一單獨個人的情感性事件，而是晚清災難救助話語的構造以及以國族認同為標誌的公眾同情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劉鶚與其說是藉由《老殘遊記》「反映」了黃河洪災創傷，不如說是透過大眾媒體參與了洪災創傷的再現，進而形塑、建構了社會與國家層次的情感認同。

五、結語

過去學者往往將《老殘遊記》的情感話語視為特定歷史悠久的文學或思想傳統在二十世紀初的延續與轉化，或是介於某個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文學史上的過渡性標誌。有別於上述文學史視角，本文將《老殘遊記》的情感話語置於十九世紀晚期生態崩潰的脈絡下理解，指出《老殘遊記》當中最為核心的情感議題是黃河洪災創傷與療癒，並進一步探討小說中的創傷與療癒書寫、劉鶚的河工技術以及晚清國族認同之間的關係。

本文指出引河水灌溉作物是小說中洪災創傷及療癒敘事中的關鍵意象，而此意象實源自劉鶚將汛期洪水引入夾河並轉化為生產資源的堤防系統設計思維。本文亦從《老殘遊記》在天津《日日新聞》的連載刊登時間以及報紙版面與廣告的安排切入，說明《老殘遊記》透過連結當下與過往的洪災現場，為當時的讀者建構了過去二十年以來的連續創傷記憶與「同胞」認同。在這個意義上，《老殘遊記》就遠遠不只是劉鶚憂國憂民、同情共感的情緒抒發，而應該被視為劉鶚以十九世紀晚期黃河洪災治理技術與機械生產思維為基礎，以報刊媒體為媒介的一次晚清災難救助、創傷療癒與國族認同話語的建構行動。

1855 年夏天黃河在河南銅瓦廂決口，從此由南向經江蘇入海改道向北經山東入海。這起巨大的自然災難對於山東與江蘇之間的居民帶來了深遠而不可磨滅的影響。1855 年以降幾十年的時間當中，黃河處於極端不穩定的狀態，頻繁地氾濫成災。對於出身江蘇淮安、治水事業的重點在山東的劉鶚來說，這場黃河的災難是毀滅性的，但它的氾濫也是富有文學生產性的。劉鶚以其治河專才自許，如何約束黃河河水、疏導至正確的方向與位置，是他最主要的關懷。在這樣的關懷下，《老殘遊記》再現了十九世紀晚期黃河氾濫所帶來的災難、淚水、創傷及其療癒的需求。

在《老殘遊記》中，黃河成為了連結苦難、創傷、愛欲、更早的文學傳統、當下的國族危機，以及小說作者劉鶚自身生命經驗與事業成就等各種複雜元素的核心意象。黃河既是小說創作的源頭，也是上述各種概念與元素往流匯聚之所在。小說

敘事所再現的即是如何藉由劉鶚的治河觀念與技術將猝不及防、毀滅性的情感在象徵層面上加以調適、容納、馴服、沉澱，最後賦予其生產性的過程。

黃河洪災不只是討論情感話語與晚清國族認同形成之間關係的關鍵議題。作為中國最古老的禍患，黃河洪災也是清中期之後對國家官僚體系而言最為棘手的挑戰。在這個意義上，洪災與治水不只是理解《老殘遊記》中的情感想像與論述的重要切入點，也應該被視為理解晚清文學、甚至是十八世紀之後的中國文學所無法忽略的參考架構。

（責任校對：吳克毅）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毛 亨 Mao Heng 傳，鄭玄 Zheng Xuan 箋，孔穎達 Kong Yingda 疏，阮元 Ruan Yuan 審定，盧宣旬 Lu Xuanxun 校，《毛詩正義》*Maoshi zhengyi*，《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Chongkan Songben shisanjing zhushu fu jiaokanji* 第2冊，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65，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刊本 Qing Jiaqing ershi nian（1815）Jiangxi Nanchang fuxue kanben。
- 王象晉 Wang Xiangjin，《群芳譜》*Qunfang pu*，《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bubian* 第80冊，濟南 Jinan：齊魯書社 Qilu shushe，2001，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Beijing daxue tushuguan cang Mingmo keben。
- 司馬遷 Sima Qian 撰，裴駟 Pei Yin 集解，司馬貞 Sima Zhen 索隱，張守節 Zhang Shoujie 正義，《史記》*Shiji* 第1冊，臺北 Taipei：鼎文書局 Dingwen shuju，1981。
- 袁 郊 Yuan Jiao，《甘澤謠》*Ganze yao*，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5。
- 鄂爾泰 E'ertai 等奉敕修，《德宗景皇帝實錄》*Dezong Jinghuangdi shilu*，《清實錄》*Qing shilu* 第56-57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7。
- 黃 璣 Huang Ji，《山東黃河南岸十三州縣遷民總圖》*Shandong Huanghe nan'an shisan zhouxian qianmin zongtu*，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年（1894）石印本 Hafo Yanjing tushuguan cang Qing Guangxu ershi nian（1894）shiyin ben。
- 黃宗羲 Huang Zongxi 編，《明文海》*Ming wenhai* 第3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7。
- 鳩摩羅什 Kumārajīva 譯，《妙法蓮華經》*Miaofa lianhua jing*，《大正新修大藏經》*Dazheng xinxiu Dazangjing* 第9冊，臺北 Taipei：新文豐出版 Xinwenfeng chuban，1983。
- 熊峻運 Xiong Junyun，《增補姓氏族譜箋釋》*Zengbu xingshi zupu jianshi*，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清雍正二年（1724）裕元堂藏版 Hafo Yanjing tushuguan cang Qing Yongzheng er nian（1724）Yuyuantang cangban。
- 趙爾巽 Zhao Erxun 等，《清史稿》*Qingshi gao* 第4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77。

- 劉 安 Liu An 撰，劉文典 Liu Wendian 注，馮逸 Feng Yi、喬華 Qiao Hua 點校，
《淮南鴻烈集解》*Huainan honglie jijie* 上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9。
- 劉 鶚 Liu E，《老殘遊記》*Laocan youji* 二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圖書館藏
天津《日日新聞》本 Jingdu daxue renwen kexue yanjiusuo tushuguan cang Tianjin
Riri xinwen ben。
- 劉 鶚 Liu E 著，李歐梵 Lee Ou-fan 導讀，《帝國末日的山水畫：老殘遊記》
Diguo mori de shanshuihua: Laocan youji，臺北 Taipei：大塊文化 Dakuai
wenhua，2010。
- 劉 鶚 Liu E 原著，徐少知 Xu Shao-zhi 新注，《老殘遊記新注》*Laocan youji
xinzhu*，臺北 Taipei：里仁書局 Liren shuju，2013。
- 劉 鶚 Liu E 著，劉德隆 Liu Delong 整理，《劉鶚集》*Liu E ji* 上冊，長春
Changchun：吉林文史出版社 Jilin wenshi chubanshe，2007。
- 鄭觀應 Zheng Guanying 著，辛俊玲 Xin Junling 評注，《盛世危言》*Shengshi
weiyen*，北京 Beijing：華夏出版社 Huaxia chubanshe，2002。
- 黎靖德 Li Jingde 編，王星賢 Wang Xingxian 點校，《朱子語類》*Zhuzi yulei* 第 4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4。

二、近人論著

- 丁福保 Ding Fubao 編，《佛學大辭典》*Foxue dacidian*，臺北 Taipei：華藏淨宗學會
Huazang Jingzong xuehui，2012。
- 天津市檔案館 Tianjinshi dang'an guan 等，《天津商會檔案匯編 (1903-1911)》*Tianjin
shanghui dang'an huibian (1903-1911)* 下冊，天津 Tianjin：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1989。
- 王汎森 Wang Fan-sen，《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Zhongguo jindai sixiang yu
xueshu de xipu*，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 Lianjing chuban，2003。
- 朱 滢 Zhu Hu，〈地方社會與國家的跨地方互補——光緒十三年黃河鄭州決口與晚
清義賑的新發展〉“Difang shehui yu guojia de kua difang hubu: Guangxu shisan
nian Huanghe Zhengzhou juekou yu wan Qing yizhen de xin fazhan”，《史學月刊》
Shixue yuekan，2，開封 Kaifeng：2007，頁 104-112。doi: 10.3969/j.issn.0583-
0214.2007.02.012
- 李文學 Li Wenxue、李勇 Li Yong，〈論「寬河固堤」與「東水攻沙」治黃方略的有
機統一〉“Lun ‘kuan he gu ti’ yu ‘shu shui gong sha’ zhi Huang fanglue de youji
tongyi”，《水利學報》*Shuili xuebao*，10，北京 Beijing：2002，頁 96-102。doi:
10.13243/j.cnki.slxb.2002.10.018

- 李明輝 Lee Ming-huei, 《四端與七情——關於道德情感的比較哲學探討》*Siduan yu qiqing: guanyu daode qinggan de bijiao zhexue tantao*, 臺北 Taipei: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Guoli Taiwan daxue chuban zhongxin, 2012。
- 李海燕 Lee Haiyan 著, 修佳明 Xiu Jiaming 譯, 《心靈革命：現代中國愛情的譜系》*Xinling geming: xiandai Zhongguo aiqing de puxi*, 北京 Beijing: 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2018。
- 李瑞騰 Lee Jui-teng, 《老殘夢與愛：《老殘遊記》的意象研究》*Laocan meng yu ai: Laocan youji de yixiang yanjiu*, 臺北 Taipei: 九歌出版社 Jiuge chubanshe, 2001。
- 周魁一 Zhou Kuiyi, 《中國科學技術史·水利卷》*Zhongguo kexue jishu shi, shuili juan*, 北京 Beijing: 科學出版社 Kexue chubanshe, 2002。
- 林天人 Lin Tien-jen, 〈清初河防政策與河工研究：以靳輔的治河為考察重心〉“Qingchu hefang zhengce yu hegong yanjiu: yi Jin Fu de zhihe wei kaocha zhongxin”, 《地理研究》*Dili yanjiu*, 45, 臺北 Taipei: 2006, 頁 93-122。
- 姚魯烽 Yao Lufeng, 〈全新世以來永定河洪水的發生規律〉“Quanxinshi yilai Yongdinghe hongshui de fasheng guilü”, 《地理研究》*Dili yanjiu*, 10.3, 北京 Beijing: 1991, 頁 59-67。doi: 10.11821/yj1991030009
- 張懷恭 Zhang Huaigong、張銘 Zhang Ming, 《清勤果公張曜年譜》*Qing Qinguogong Zhang Yao nianpu*, 杭州 Hangzhou: 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guji chubanshe, 2009。
- 盛 成 Sheng Cheng, 〈關於《老殘遊記》〉“Guanyu Laocan youji”, 《清末小說研究》*Qingmo xiaoshuo yanjiu*, 7, 天津 Ōtsu: 1983, 頁 10-19。
- 陳 樺 Chen Hua、劉宗志 Liu Zongzhi, 《救災與濟貧——中國封建時代的社會救助活動 (1750-1911)》*Jiuzai yu jipin: Zhongguo fengjian shidai de shehui jiuzhu huodong (1750-1911)*, 北京 Beijing: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2005。
- 陳俊啟 Chen Chun-chi, 〈《老殘遊記》中的「個人主觀主義」及其在小說史上的意涵〉“Laocan youji zhong de ‘geren zhuguan zhuyi’ ji qi zai xiaoshuoshi shang de yihan”, 《文與哲》*Wen yu zhe*, 12, 高雄 Kaohsiung: 2008, 頁 579-630。
- 劉德隆 Liu Delong、劉瑀 Liu Yu, 《劉鶚年譜長編》*Liu E nianpu changbian*, 上海 Shanghai: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tong daxue chubanshe, 2019。
- 潘家錚 Pan Jiazheng, 《千秋功罪話水壩》*Qianqiu gongzui hua shuiba*, 北京 Beijing: 清華大學出版社 Qinghua daxue chubanshe; 廣州 Guangzhou: 暨南大學出版社 Jinan daxue chubanshe, 2000。

- 蔡泰彬 Tsai Tai-pin, 《晚明黃河水患與潘季馴之治河》 *Wan Ming Huanghe shuihuan yu Pan Jixun zhi zhihe*, 臺北 Taipei: 樂學書局 Lexue shuju, 1998。
- 顏健富 Guan Kean-fung, 〈「病體中國」的時局隱喻與治療淬鍊——論晚清小說的身體／國體想像〉“‘Bingt Zhongguo’ de shiju yinyu yu zhiliao cuilian: lun wan Qing xiaoshuo de shenti/guoti xiangxiang”, 《臺大文史哲學報》 *Taida wenshizhe xuebao*, 79, 臺北 Taipei: 2013, 頁 83-118。doi: 10.6258/bcla.2013.79.03
- Alexander, Jeffrey C. et al.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Berkeley/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doi: 10.1525/9780520936768
- Cullen, Frank et al. *Vaudeville Old & New: An Encyclopedia of Variety Performers in America*.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 Dodgen, Randall A. *Controlling the Dragon: Confucian Engineers and the Yellow Riv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doi: 10.1515/9780824861995
- Edgerton-Tarpley, Kathryn. *Tears from Iron: Cultural Responses to Famin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doi: 10.1525/california/9780520253025.001.0001
- Garrard, Greg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cocritic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doi: 10.1093/oxfordhb/9780199742929.001.0001
- Hsia C. T. “The Travels of Lao Ts’an: An Exploration of Its Art and Meaning,”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7.2, 1969, pp. 40-68.
- Pietz, David A. *The Yellow River: The Problem of Water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doi: 10.4159/harvard.9780674736108
- Průšek, Jaroslav. *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 Schulze, Robin G. “Marianne Moore’s ‘Imperious Ox, Imperial Dish’ and the Poetry of the Natural World,”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44.1, 1998, pp. 1-33. doi: 10.2307/441695
- _____. “Textual Darwinism: Marianne Moore, the Text of Evolution, and the Evolving Text,” *TEXT: An Interdisciplinary Annual of Textual Studies*, 11, 1998, pp. 270-305.

Tears, the Yellow River, and Hydraulic Technology: The Flood Trauma in *The Travels of Lao Can*

Hsu Hui-l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lhsu@cuhk.edu.hk

ABSTRACT

The late 19th century is widely known as the period of modernization in China. But it was also the time that witnessed the highest frequency of flooding of the Yellow River in history. Yellow River flood management, a top priority in internal affairs for the Chinese empire since antiquity, became an urgent and immediate task as well as a pivotal part of the modernization project for the Qing government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s a technician deeply engaged in regula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in the 1890s, the late Qing novelist Liu E 劉鶚 (1857-1909) begins his celebrated *The Travels of Lao Can* 老殘遊記 with the theme of Yellow River floods. The flooding caused by the Yellow River breach was an unbearable trauma for Liu E, who himself was unable to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Yellow River and personally witnessed the ensuing tragedy.

Prior to *The Travels of Lao Can*, there had never been a Chinese literary work that dealt directly with the traumatic experience of mass death. How did *The Travels of Lao Can* describe and deal with such trauma that had never been written about? Did the trauma caused by the flooding of the Yellow River involve a more complicated technical orientation for Liu E, who, compared with the simple bystanders of the disaster, was directly involved in river management? In the novel,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covery from this trauma and river technology? This paper sheds ligh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crises and the incep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China by examining how *The Travels of Lao Can* was shaped by and responded to the trauma caused by the Yellow River floods in Shandong in the year 1889.

Key words: Liu E 劉鶚, *The Travels of Lao Can* 老殘遊記, the Yellow River flood, trauma, river engineering

(收稿日期：2019. 8. 16；修正稿日期：2019. 11. 2；通過刊登日期：2019. 11. 25)